

苏东坡《七绝一首》茶诗文化负载词英文转换解读

陈文慧¹, 朵云峰²

(1. 昆明学院 外国语学院, 云南 昆明 650214; 2.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计算机信息学院, 云南 昆明 650033)

摘要: 中国是茶的发源地,也是诗的国度,以茶入诗,二者的交融滋生了茶诗这一文化瑰宝。茶诗中的文化负载词承载着一个民族的千年文化积淀,以苏轼茶诗《七绝一首》为例,诗中的“维摩”“灵运”“魏帝”和“卢仝”,包含了极深的历史和文化意涵,也为跨语言文化读者理解带来了困难,通过对这些词或以模仿的方式翻译转换,或以模仿与解释的方式结合译出,有助于非母语读者更好地理解和赏析原诗歌之神韵。

关键词: 茶诗;七绝一首;文化负载词;语言文化转换

中图分类号: H3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5639(2015)05-0132-05

DOI: 10.14091/j.cnki.kmxyxb.2015.05.021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English Transformation about the Culture-specific Terms in the Tea Poem by Su Dongpo

CHEN Wen-hui¹, DUO Yun-feng²

(1.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Kunming University, Yunnan Kunming 650214, China;

2. Computer and Science Department, Kunming Metallurgy College, Yunnan Kunming 650033, China)

Abstract: The tea poetry, the combination of both tea and poetry which are Chinese-characterized, is valuable in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culture-specific terms in the tea poetry involve the national culture for hundreds of years. Four terms such as Weimo, Lingyun, Wei Di and Lu Tong in the tea poem by Su Dongpo contain profound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 on one hand and make the poem difficult to appreciate on the other hand. The approaches of translation, including imitation and the combination of imitation with interpretation, are helpful for better understanding and appreciation of the meanings of the original poem.

Key words: tea poem; a tea poem by Su Dongpo; culture-specific terms; cross-cultural transformation

一、引言

汉代《神农本草经》中有这样的记载:“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三国时魏国张揖所撰的《广雅》中也有茶的相关记载,云:“荆、巴间采叶做饼,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欲煮茗饮,先炙令赤色,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用葱、姜、橘子笔之。其饮醒酒,令人不眠。”由此,茶之饮及其记载由神农氏开始流传于世。茶可消渴、茶可清燥、茶可助清思,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茶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茶业和茶文化的发展至盛唐时期已

是蔚然大观,有陕西宝鸡法门寺出土的唐时宫廷茶具,有被奉为茶之经典的《茶经》,更有洋洋洒洒又各具特色的唐、宋茶诗。后明代文学家徐渭在其《煎茶七类》中把茶客和喝茶的环境做了描述:“饮茶宜凉台净室,明窗曲几,僧寮道院,松风竹月,晏坐行吟,清谈把卷”,“饮茶宜翰卿墨客,缙衣羽士,逸老散人,或轩冕中之超轶世味者”,“除烦雪滞,涤醒破睡,谭渴书卷,是时茗碗策勋,不减凌烟”。茶的秉性使茶注定与文人雅客有着不解之缘,更与诗歌难分难解。

收稿日期:2015-01-20

作者简介: 陈文慧(1977—),女,云南昆明人,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翻译理论及实践研究;朵云峰(1977—),男,云南个旧人,讲师,主要从事计算机应用研究。

二、苏轼的《七绝一首》及其英译

茶清幽的本性使茶与诗结缘,尤其自中唐以来,随着茶叶生产和贸易的发展,茶更是成为诗人口中、笔下吟诵的对象,如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著名诗人均以茶入诗。宋代时,茶更是步入寻常百姓家,其文化进一步发展成熟,而苏轼、范仲淹、蔡襄等迁客文人则推动了茶诗的发展。其中,苏轼《饮湖上初晴后雨》中的“欲把西湖比西子”一句与他另一首诗中的句子——“从来佳茗似佳人”相映成趣,成为千古佳话。苏轼不仅是诗人,也是茶人,东坡先生对种茶、烹茶、品茶乃至茶壶的设计均颇有心得,其一生精于茶道,写有茶诗70多首,《七绝一首》(或称《游诸佛舍,一日饮酺茶七盏,戏书勤师壁》)便是其一:

示病维摩原不病,在家灵运已忘家;

何须魏帝一丸药,且尽卢仝七碗茶。

苏轼文采绝代,短短几句诗便让读者对其才窥见一二。茶诗是中国文化的瑰宝之一,在对外交流重要而频繁的今天,茶诗的英译可让英语读者从茶这样一个独特的视角了解到更多的中国文化。大连理工大学的姜欣、姜怡二位教授英译的《茶经·续茶经》中就将苏轼《七绝一首》茶诗进行了英语的跨文化转换:

Weimo's the sick monk ailed no more,

Secular Lingyun quitted all his desire.

Emperor Wei Di's panacea fails to appeal,

When the seven cups of Lu Tong tea inspire.^[1]

正如诗名《游诸佛舍,一日饮酺茶七盏,戏书勤师壁》所示,此诗成于诗人一日游诸佛寺又饮茶数碗之后。

苏东坡虽然才满天下,但其仕途却并非一帆风顺。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新政而被王使人奏其过失,难立于朝,只有求请外职,于熙宁五年(1702年)年授任杭州通判。在此期间,苏轼因病告假,游湖上、南屏诸寺,并拜谒惠勤禅师,一日之内已不觉饮茶数碗,不知不觉,病已痊愈,便于禅师的粉墙之上题诗一首,即这首《游诸佛舍,一日饮酺茶七盏,戏书勤师壁》。

短短七绝四句的一首七绝,将东坡先生精通佛理而又贯通史学的才华展现无遗。读者可从首句中的“维摩”一词便可知晓其不仅精通佛理,更可以游

刃有余、以禅入诗。第二句中的“灵运”应为谢灵运,其为我国南北朝时期杰出的文学家、旅行家。第三句中的“魏帝”一词指的是曹魏高祖文帝曹丕,同样折射的是诗人对史书的融会贯通。除了佛理、史学,诗人苏轼同样精于茶道,末句中的“卢仝”则是唐代的著名诗人、茶人,其著有流传千年的茶诗——《七碗茶》。

诗中的“维摩”“灵运”“魏帝”以及“卢仝”四词均为此诗中的文化负载词,也是诗歌的神韵所在。文化负载词又被称为文化词汇、文化专项词、文化特有词、文化内涵词以及文化空缺词等。廖七一教授将之定义为:“标志某种文化中特有事物的词、词组和习语。这些词汇返回了特定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渐积累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的生活方式。”^[2]词既是民族语言的一个核心,也是民族文化信息的主要承担者,所以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中就注定含有几千年积累来的诸多文化负载词,而这些处于中西方文化空缺之中的特有词汇的翻译就势必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承担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其翻译的有效程度也就决定着汉语在对外交流过程中的有效度。本文旨在探析苏轼《七绝一首》茶诗中文化负载词的跨语言翻译转换策略及其有效度,从而为茶诗的英译从跨文化转换的视角提供一种别样的赏析。

三、诗中文化负载词的跨语言文化转换

文化负载词充分显示了语言文化的异质性。虽然异质性只是处于语言第二位的性质(第一位是同质性),但正是由于这处于第二位的异质性才使得不同民族的不同语言争芳斗妍。刘宓庆教授在其写作历时十载的专著《文化翻译论纲》中分析、归纳了语言文化异质性的三个根源,首当其冲的是文化源流。刘教授认为:“不同的文化源流(包括历史发祥、地缘格局、人文肇始、社会演变、典制沿革、政治及经济形态)是语言文化异质性之最初始的滥觞。”^{[3]39}刘教授进而探讨的语言文化异质性根源之二则为语言结构,其认为“对翻译学而言,结构只有与意义和功能紧密相连才有意义。没有意义和功能的结构只是一种空框架,含蕴意义和功能的结构就成了可以赖以把握意义的物态手段或物质依据”^{[3]40}。根据刘教授的分析,最后一种语言异质性

根源是思维方式,而此方式是指“整体的、基本的表现模式及至行文风格”^{[3]44}。如此看来,不同民族不同的文化源流、语言结构和思维方式注定了这些不同语言中只有本族语才特有文化负载词的存在。文化负载词在代代相同文化的传承中也得到了保存和发展,但只有本民族或是充分了解本族文化的人才能理解这些词的含义。反之,这样的传承也给这些在不同民族、不同语言间“流通度”不高甚至不能“流通”的词的跨文化转换,或者说是这些文化负载词对其他语言读者的横向信息传递造成了巨大的困难。

面对这些跨文化语言转换中的困难,许多学者纷纷探讨翻译策略,并提出自己的看法。其中,邱懋如先生提出的是直译、照抄原文、音译、替换以及解释的转换方法(邱懋如,2000:324-325),王东风教授的观点是文外作注(直译加注释)、文内明示(直译与意译相结合)、归化(替换)、删除和硬译(即按字面照译原文)(王东风,2000:248-253)。另外,西班牙翻译家 J. F. Aixela 的 11 项翻译策略更为具体,其中包括重复、转换拼写(即音译)、语言翻译(即尽量保留原文的指示意义)、文外解释(翻译加脚注、尾注、文内注和评论等的解释)、文内解释(即解释放在正文内)、使用同义词、有限世界化(即选用读者较为熟悉的另一个原语文化专有项)、绝对世界化(即用非文化专有项翻译文化专有项)、同化(即选用译语文化专有项来体会原语文化专有项)、删除以及自创(即引进原文所无的原语文化专有项)(Aixela,1996:52-53)。

刘宓庆教授也从自己的跨语言文化转换视角提出了对应、代偿两大方法,这两大方法又各细分为二式和三式。其中,第一大方法——对应——包含的二式为契合式与模仿式,代偿含纳的三式则为解释式、替代式以及淡化式。(刘宓庆,2011:200-201)因为不同民族具有相似的,甚至是共同审美经验,因此不同民族间文化意象的契合也是极有可能的。这样的相似造就了跨文化转换时不同语言的契合。刘教授所示的模仿式即为直译和音译,其中也包括借用。模仿式的优势在于推动外来词,或者说是外来文化概念的引进。代偿中的第一式是解释式,也是刘教授极为推荐的方式,其认为:“解释可长可短,短的时候可以在音译后加上一个范畴词。”^[4]代偿

的第二式是替代式,指的是“在契合对应缺如时以大体等值或大体等效的词语代替”^[4]。代偿的最后一式为淡化式,这是专为不得已要放弃的文化含义所准备的。当然,在讨论这些不同的转换方式时,刘教授认为包含解释、替代和淡化的代偿是更为广泛和使用普遍的方法,但究择何一,还需以个案为准。此文就以苏轼《游诸佛寺,一日饮酺茶七盏,戏书勤师壁》茶诗中文化负载词为个案来探析姜欣、姜怡二位译者英译本中这些文化负载词的跨语言文化转换方式。

原茶诗首句中出现的“维摩”这一文化负载词,即英译中所对应的 Weimo。维摩又称维摩诘,大乘佛教早期的经典之一——《维摩诘经》就是以其而得名。此经因宣传人在世俗生活中亦可修炼成佛而得到众多在家居士的青睐,唐代著名诗人王维就因受此经影响而将自己取字为“维摩”,号维摩居士。维摩原为毘舍离城中的一位在家居士,其富有而又慈悲,妻子貌美名无垢,一双儿女名善思童子和月上女,一家人皆具善根,维摩也被尊奉为佛陀时代的第一居士。“维摩示病”隐含着装病在家的维摩诘向奉佛祖之意前来探病的文殊菩萨宣讲大乘佛法的典故。“维摩”这一开篇即现的文化负载词充分体现了诗人苏轼与佛教的紧密关系。唐代是佛教发展的鼎盛时期,到宋朝也是一度繁荣。佛教在传入中国时,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已经有着相当的高度,在这样的文化土壤中发展和传播的佛学思想势必被文人学子改造而富有中国式特征,即被融入中国传统老庄思想的痕迹,正如笔者在另一文《柳宗元〈江雪〉中空寂的禅蕴之美的英译传递解读》中所探讨的“中国士大夫历来都有着庄子式的自然、清静以及淡泊的人生传统哲学,而禅宗在中国的传播、发展深受庄玄影响,故而,中国士大夫的思想与禅宗宣扬不谋而合”^[4]。作为饱受儒家思想浸润以及庄周思想熏染的典型文人志士,苏轼的思想也深受佛学禅宗的影响,更何况他还出身于一个佛教思想浓郁的家庭。苏轼之父苏洵向来与名僧来往密切,母亲笃信佛教,弟弟苏辙则“手披禅册渐忘情”^[5],其与苏轼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向来亲近佛理的苏轼于其众多诗中融会了《楞严经》《法华经》《圆觉经》等诸多佛经中典故,《维摩经》即是其一。自其初仕凤翔时所写的《维摩像唐杨惠之塑在天柱寺》至后来的

《石恪画维摩颂》中称颂维摩的神通广大,再到《臂痛谒告作三绝句示四君子》中直言“维摩示病吾真病,谁识东坡不二门”等,无不彰显出苏轼与《维摩经》的不解之缘。回看“维摩”一词的英译,译者首先使用了模仿式将其直接音译为 Weimo。这位佛经中著名人物的名字原为梵文,早期被译介入中国之时即被译为“维摩”或“维摩诘”。为了在别的语言中(例如英语)延续这个名字的发音,以便英语读者能够直接了解此名所指,模仿、音译的方式是最为妥帖和有效的。“示病维摩”在英译时原文中的定语——“示病”被移至主语——“维摩”之后作为表语——the sick monk。这样的转换使不熟悉佛经典的读者明了了维摩的身份,但是维摩只是显示出生病的样子,而不是真的生病,英译中的 Weimo's the sick monk ailed no more 似乎未能将“示病”的真意更加明白地体现出来。

茶诗第二句“在家灵运已忘家”中也含有一文化负载词——灵运。虽未提及姓氏,但熟悉中国文化的读者皆知其应为“谢灵运”——中国山水派诗歌创始人,南北朝时期人,其还有另一更为人们熟知的身份——旅行家。无独有偶,谢灵运也是一生好佛之人,其对《维摩经》十分推崇,他对《维摩经》的喜好以及后者对他的影响为后世留下了深刻印象。《景德传灯录》卷四中有过这样的记载:鸟巢禅师对白居易说:“汝若了净智妙圆,体自空寂,即真出家,何假外相,汝当为在家菩萨,戒施俱修如谢灵运之侍也。”“在家灵运”即由此出。如此看来,苏轼的笔下出现谢灵运并非偶然,而是这部富有小说及戏剧意味的文学式佛教经典在古往今来众多文人雅士中的受欢迎程度、可以完美调和出世与入世矛盾的维摩居士的个人魅力以及苏轼对历史和佛理的博学多识使然。再看二位姜教授的英译,人名“灵运”已按照模仿的规则音译为 Lingyun。对于人名而言,诸如维摩和灵运,直接的音译应是较好的跨文化转换方式。基于对原诗的充分理解,译者将“在家”译作了 secular(世俗的、尘世的)。此诗虽为诗人饮茶之后所作,但其间充满了禅韵。此时的“在家”已非平日所言的普通意义上的家,而是相对参禅之人出世而言的入世,即我们平日的凡尘、俗界。因此,译者以阐述式的有效手段直接道出其蕴含,给英文读者一目了然的感受。相对于“在家”而言,“忘家”则指的是

出世,摒弃自己俗世的欲望。这样,正如“在家”的英译转换,quitted all his desire 的解释式的转换也同样让读者直接获取“忘家”的蕴含。

至于原诗中第三句中的“魏帝”则指的是魏文帝曹丕,即曹操之子、三国中魏国的开国皇帝。据说魏文帝曹丕文武双全,既善骑射、击剑,又通今博古、善诗词歌赋,《折杨柳行》一诗即出自其笔下:

西山一何高,高高殊无极。

上有两仙童,不饮亦不食。

与我一丸药,光耀有五色。

服药四五日,身体生羽翼。

诗句中的西山位于今河南林县以西,古名为隆虑山亦为林虑山。《太平御览卷》中第四十五卷论及隆虑山时引用《颜修内转》曰:“桥顺,字仲产,有二子,曰璋,曰琮,师从仙人卢子基於隆虑山栖霞谷,教二子清虚之术,服飞龙药一丸,十年不饥。”之后又有明确记载:“魏文帝诗曰:‘西山有双童,不饥亦不食。’谓此也。”当日曹丕护送其父曹操西征至林虑山时,有感而发,写成此诗。诗中西山即为林虑山,两仙童就是拜仙人卢子基为师的二童——璋和琮。二童在学习了师傅的清虚之术后服飞龙药一丸,十年无饥饿之感。曹丕学识渊博,据此典故写成《折杨柳行》。苏轼更是通晓古今,以曹丕之诗入自己诗,由此衬托对茶的喜爱之情。短短七字蕴含的历史文化语境对绝大多数译者而言都绝非易事。首先,从词的转换层面来看,英译本的转换中直接将“魏帝”译为 Wei Di,这样的转换当然会使英文读者读来不知所云,但是译者于 Wei Di 之前增补了其身份 emperor,这样的解释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英文读者的文化知识空缺。遗憾的是,即使是解释式的转换,有关“魏帝”的真名等历史文化信息还是无法在如此短小的诗句中一一体现。根据曹丕《折杨柳行》诗中之意,“一丸药”在英译本中为 panacea,“药”或是“灵丹妙药”在英汉两种语言中有相当的契合对应,这样的文化转换也是非常可行及有效的。其次,就诗句的层面而言,原诗中的问句——“何须魏帝一丸药”在英译中以反面陈述的方式呈现:Emperor Wei Di's panacea fails to appeal。虽然这样正话反说的方式会使原诗的意蕴有所减损,但却可使英文读者直接感知茶对诗人的吸引力,如此的吸引力哪怕是魏帝的灵丹妙药也不能及。

“且尽卢仝七碗茶”为原诗的最后一句,也是全诗的精华所在。熟悉中国茶文化的人都对“卢仝”其人耳熟能详。“茶之为饮,发乎神农,闻于周公……滂时浸俗,盛于国朝。”唐代“茶圣”陆羽的《茶经》这样记载着到唐代已呈普遍之势的饮茶习俗。唐人封演的《封氏闻见记》中也有“自邹、齐、沧、隶,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取钱投饮”这样的反映饮茶习俗已深入民间寻常百姓家的记录。仅次于陆羽的同时代诗人、茶人——卢仝也有佳作《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流传千古,其中“七碗茶”部分最为世人称颂:“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卢仝博览经史可又不愿进仕,也许正是他性格中的这一份与世无争使得他能够更好地品味每一杯茶,并且使品尝之后的那一份审美愉悦在笔下留存。诗人苏轼喜将典故入诗,更喜用卢仝之诗入其诗,从《汲江煎茶》中的“枯肠未易禁三碗,坐听荒城长短更”,到《马子约送茶,做六言谢之》中的“惊破卢仝幽梦,北窗看起云龙”,再到本文中论及的《游诸佛舍,一日饮酺茶七盏,戏书勤师壁》中的诗句,足见卢仝和他的“七碗茶”温润了苏轼的笔,也为中国文学史注入了几分灵韵。此句中的文化负载词“卢仝”的英语跨文化转换,译者仍旧是使用了最直接的模仿式将此名音译而出。“七碗茶”也是直译成 the seven cups,“卢仝七碗茶”即为 the seven cups of Lu Tong。就诗句本身意义而言,这样的转换已是道尽其义,只是卢仝究竟为何许人,诗歌翻译因为篇幅的问题未能进行阐述,稍许遗憾。就诗句层面而言,诗中的“且尽”二字表现的是诗人饮茶之后的酣畅淋漓,以及茶带给诗人的振奋之感,译诗中译者使用了 inspire 一词,颇为得当地直接展现出了诗人饮茶后身体上的爽朗及精神上的感悟。

纵观之,苏轼茶诗《游诸佛舍,一日饮酺茶七盏,戏书勤师壁》中的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以“模仿和解释”式为主要手段。“维摩”是译者选择了音译人名之后又在句中以表语的成分进行身份的解说,是

“模仿+解释”的模式。“灵运”是意译“在家”之后音译“灵运”之名,也属于“解释+模仿”的模式。还有,“魏帝”虽已然揭示其身份,但译者仍旧补译出 emperor,使读者一目了然,当为“解释+模仿”。最后的“卢仝”也是以模仿的方式音译而出,因为卢仝与其茶诗中“七碗茶”的紧密关系,译者将二者合二为一——the seven cups of Lu Tong。如此看来,“模仿与解释”的结合为此苏轼茶诗中文化负载词翻译的主要转换方式。

四、结 语

“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茶的使用也许由此而出,虽然茶在中国最早是以药用和食用的形式而出现的,但其作为饮品的历史也有几千年。人们常说“柴米油盐酱醋茶”,或者是“琴棋书画诗酒茶”,无论是普通寻常百姓家还是文人雅士道观丛林,茶可俗,亦可雅,茶诗亦如一朵清幽的兰花,使中国诗歌散发出几许沁人馨香。茶诗的英语文化转换也为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茶诗中的文化负载词相对英语读者而言是不甚熟知的,这就要求译者将这些文化负载词放入源语的历史文化背景中进行意义的准确剖析,并以适当的模式进行译语转换。译者只有在极为有限的篇幅内尽量以少而精的词对文化负载词以文化阐释,并力求在这样的文化阐释中使译文对译诗读者的效果与原诗对原诗读者的效果尽量接近,这样译诗读者才可以跨文化的方式来更多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

[参考文献]

- [1] 姜怡. 茶经·续茶经汉英对照[M]. 姜欣,译.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394.
- [2] 廖七一. 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M].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232.
- [3] 刘宓庆. 文化翻译论纲[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7.
- [4] 陈文慧. 柳宗元《江雪》中空寂的禅蕴之美的英译传递解读[J].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4(1):88-91.
- [5] 苏辙. 栾城集[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264.